

比较

NO.1, 2014

70

COMPARATIVE STUDIES

吴敬琏 主编

达龙·阿西莫格鲁 詹姆斯·罗宾逊
经济学VS政治学：政策建议的误区

托尔斯滕·佩尔松 圭多·塔贝里尼
宪政与经济政策

迈克尔·克莱门斯
经济学与移民：人行道上的万亿美元？

爱德华·格莱泽
城市的经济学分析

布拉德福德·德龙
美国经济增长的前景

张春霖
曼德拉身后的南非

德里克·莫里斯
竞争政策与自然垄断行业的价格管制

罗纳德·麦金农
全球经济中的格林斯潘—伯南克泡沫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财税改革课题组
深化财税体制改革的基本思路与政策建议



中信出版社
CHINA CITIC PRESS

比较

No.1, 2014

C O M P A R A T I V E S T U D I E S

70

吴敬琏 主编

中信出版社
CHINA CITIC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比较·第 70 辑 / 吴敬琏主编.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14.2

ISBN 978-7-5086-3612-2

I. ①比… II. ①吴… III. ①比较经济学 IV. ① F06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010763 号

比较·第七十辑

主 编: 吴敬琏

策 划 者: 《比较》编辑室

出 版 者: 中信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中信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 财新传媒有限公司

承 印 者: 北京华联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11.75 字 数: 200 千字

版 次: 2014 年 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86-3612-2/F · 3114

定 价: 28.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 由发行公司负责退换。

服务热线: 400-696-0110

<http://www.caixin.com>

010-58103380

E-mail: service@caixin.com

比较

COMPARATIVE STUDIES

主管 中信集团

主办 中信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 中信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主编 吴敬琏

副主编 肖梦 吴素萍

编辑部主任 孟凡玲

编辑 包敏丹

封面设计 李晓军 / 美编 杨爱华

经营部

总经理 吴传晖 (兼)

常务副总经理 张翔

总经理 董光明

华东/华南总经理 汪弘彬

高级市场总监 金楠

市场总监 戈悦

发行总监 邱道姗

设计总监 石乐凯

品牌传播总监 马玲

独家代理: 财新传媒有限公司

电话: (8610) 85905000 传真: (8610) 85905288

广告热线: (8610) 85905088 85905099 传真: (8610) 85905101

电邮: ad@caixin.com

订阅及客服热线: 400-696-0110 (8610) 58103380 传真: (8610) 85905190

香港地区订阅热线: (00852) 21726522

订阅电邮: circ@caixin.com 客服电邮: service@caixin.com

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西大望路1号温特莱中心A座16层 (邮编: 100026)

卷首语

2014年及未来几年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如何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做出的各项改革部署。根据国内外的经验，改革的成功实施至少有赖于两个条件：一是明确目标。以反腐为例，老虎本身只是权力不受限制的一个结果，如果把打老虎视为目标，而不尽早着力解决能把“权力关进笼子”的制度问题，就会出现“打了一只老虎，还有后来虎”，戏剧性的事件离反腐的真正目标有距离。“笼子”，无外乎主编吴敬琏所说的三个东西：法治、民主和宪政。这是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的根本制度保障，否则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就无法合理界定，权钱交易就时刻腐蚀着社会、政治和经济。二是根据目标，制定切实可行的改革方案。用经济学术语来说，改革方案是激励相容的，可实施且帕累托改进的，这样，改革不仅能赢得初始的支持，为自身开辟道路，还能因此而持续深入。本辑《比较》围绕着改革实施这个话题，选取相关文章，供关注改革实施和改革方案设计的读者们参考、借鉴。

麻省理工学院达龙·阿西莫格鲁教授和哈佛大学詹姆斯·罗宾逊教授因《国家为什么失败：权力、繁荣和贫困的根源》一书广为人知，该书试图探索经济和政治之间的相互影响，以及什么样的经济和政治制度决定了一国的可持续发展 and 繁荣。“经济学 VS 政治学：政策建议的误区”延续了他们“经济和政治相互影响”的观点，通过一个简单的理论模型和许多案例，说明旨在纠正市场失灵的经济政策往往会改变特定政治团体的经济租金，或者改变他们的收入分配，结果造成了政治上不利的后果；而且，由于政治家的激励相容约束条件得不到满足，许多这类理想化的政策在执行过程中遭到事实上的扭曲，结果无论经济还是政治都事与愿违。这篇文章，对处于向现代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的国家提供了重要的思考，对当前中国经济改革的设计和实践也具有现实的启发价值。

诺贝尔经济学奖评委会前主席托尔斯滕·佩尔松和意大利经济学家圭多·塔贝里尼的“宪政与经济政策”一文主要讨论宪政如何影响经济政策的制定。他们首先归纳了宪政的两个最基本特征：选举规则和政府形式。然后，在此基础上，说明相关的宪政元素如何影响政府的可问责性、政治租金和腐败的规模，以及政府的代表性和各种财政政策选择。例如，可以分为多数制和比例制，而这其中的选票结构、选区规模和选举公式等具体细节，都会直接影响政客的激励，进而影响经济政策的制定。理论和经验研究表明，选举规则中的简单多数制通过强化政客取悦选民的激励加强了问责制，并促使政治租金降低、

腐败现象减少。但这也令政治候选人更积极回应关键选民群体的意愿,使他们更有可能在利益上偏袒部分选区,而且会牺牲福利国家支出和一般公共产品这类能惠及更多人群的项目。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宪政不是一个“高大上”的理念,而是由具体规则构成的一整套制度安排,它的细节决定它的成败。

移民问题从来不是中国关注的大问题,那是发达国家头疼的事。然而,人们从贫穷国家潮水般涌入富裕国家,从事各种各样的工作,其实与我们的农民工有着非常类似的窘况。到底怎么看待移民,是负担、是收益,是对贫穷国家的穷人的更大不公,还是什么……华盛顿智库全球发展中心的资深研究员迈克尔·克莱门斯要讨论的正是移民给全球经济带来的收益。虽然相比于过去,全球劳动力流动的自由度已经大大提高,但是依然存在着很多壁垒,克莱门斯提供的研究数据表明,通过消除贸易政策和资本流动壁垒,估计的收益不到世界GDP的百分之几,而消除劳动力流动壁垒,估计的收益通常在世界GDP的50%—150%之间。即使综合考虑移民对原籍国和移入国工资的影响以及其他因素,移民流动带来的收益也将达到全球GDP的20%—60%。鉴于此,克莱门斯认为,“国际移民”应该成为经济研究优先关注的焦点,以便更好地理解全球劳动力流动收益的特征,探究实现部分收益的政策工具。为此,他提出了一个包含四个问题的研究议程。这不由让我们想到,当国内学者们在讨论中国的城市化和人口迁移问题时,首先想到的,往往是移入人口带给城市的负担,而很少研究他们可以给整个国家经济带来的大量收益。在这个意义上说,克莱门斯的研究对于我们研究城市化过程中的国内移民问题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爱德华·格莱泽的研究横跨多个领域,从制度经济学、公司治理、转轨经济学、法和经济学到城市经济学。他关于城市经济学的著作《城市的胜利》广获好评。在“城市的经济学分析”一文中,格莱泽探析了城市的经济学分析的关键要素。首先,城市经济学分析依赖于三大经济学支柱:激励机制、无套利均衡,以及好的政策能够拓宽个人的可选择范围。人们经常错误地认为,经济学家所说的激励单指经济激励,其实更重要的是人们对激励作出的反应。城市经济学的理论核心——空间均衡概念,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城市之间的生产率差异、收入差异以及城市中的住房市场。城市经济学分析还非常注重经验研究,帮助我们找到影响城市发展的各种相关因素。作者在谈到城市经济学的政策处方时,特别指出,其核心观点是以人为本:“对大多数经济学家来说,能营造一个美丽的城市却不增加个人福利的城市政策,并没有吸引力。在他们看来,给人们带来的收益大于成本的政策才是有意义的……这一点使经济学家有别于某些重建设的城市规划者和以地方为本的政客。”

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至今仍未消退,美国经济增长的前景牵动着全球经济的神经。即使在美国国内,也是意见不一,既有乐观者,也不乏悲观者。伯克利加州大学的布拉德福德·德龙教授无疑是乐观派,针对克鲁格曼、罗伯特·戈登、泰勒·科文和布林克·林德赛等一干重量级经济学家的“技术—增长停滞论”,德龙教授提出了八条反驳意见,并认为美国可以继续维持实际人均GDP

每年增长1.7%的趋势，如果能正确衡量欧美国家的物质福利水平，就意味着能达到3%的年增长率。在他看来，美国在长期内保持稳定的经济增长，面临的重大问题并非创新枯竭、技术停滞，而是制度设计。因为市场仍在产生原有的激励，鼓励人们不断创新，不断提高效率。他告诫说，过度关注实际GDP的增长及其可能出现的放缓前景，会导致政策决策陷入恐慌，反而带来并非真正想要的结果。

近年来，南非经济增长势头强劲，被纳入金砖国家的行列，也是中国越来越重要的贸易伙伴。但是，对于南非经济的真实状况，总是隔岸观花，不甚了了。所幸，《比较》的编委张春霖，自2009年11月至今一直在世行南非办事处工作，对南非有切身的了解和感受。因此，我们邀请他写了一篇关于南非的专稿《曼德拉身后的南非》。从张春霖的笔下，我们看到，自1994年南非消灭种族歧视，进入民主和自由社会后，无论是政治上还是经济上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是，南非“致富之路”仍然困难重重：南非依然是世界上贫富最悬殊的国家之一，基尼系数高达0.7；南非的失业问题依然非常严重，这也是导致收入差距畸高的一个关键原因；南非的经济结构仍然保持“一个国家，两个经济”的二元结构；南非的劳动力市场管制导致劳动力成本居高不下，严重掣肘了制造业的发展，通过教育和技能开发提高劳动生产率也面临着严峻挑战。

“法和经济学”栏目选取了英国竞争政策委员会（现更名为竞争与市场管理局）前主席德里克·莫里斯的文章。莫里斯详细介绍英国监管自然垄断行业的主要工具RPI-X机制，该机制允许价格每年以一个特定的比例X%增长，这个比例要小于零售价格指数的上涨。这个机制不仅有效地提高了自然垄断行业的效率，也大大改善了公众的福利。在分析RPI-X机制的时候，莫里斯还着重强调了信息、激励和治理的重要性。这些议题恰好也是中国经济改革和竞争政策需要面对的主要挑战。

“特稿”栏目是斯坦福大学麦金农教授的文章。他认为，全球金融危机后，伯南克执掌的美联储正在制造继格林斯潘后的第二个泡沫。泡沫导致热钱的涨落和流动，对新兴市场和其他发展中国家造成巨大冲击，造成一些国家的政治动荡，例如，突尼斯的粮食动乱，由此引爆了“阿拉伯之春”。除美国之外的其他工业化国家也都采取了量化宽松的政策，为自己制造了一个难以逃脱的货币陷阱。麦金农的观点与量化宽松力挽狂澜、救世界经济于不倒的观点对立，不同观点的呈现，也值得我们参考。

财税体制改革是新一轮改革的重点，《决定》也提出了方向性的改革原则，但具体的改革措施仍有待进一步讨论。刘克崮领衔的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财税改革课题组就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提出了基本思路和政策建议。这些建议包括，政府间职责和支出责任划分、政府间收入划分，政府间转移支付制度改革要点、三级税收征管体系的建设以及预算和支出管理的改革等。他们还指出，财税改革还必须与价格、财税信息数据系统、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土地制度改革、金融改革等配套联动。

目 录

Contents

第七十辑

1 经济学VS政治学：政策建议的误区

达龙·阿西莫格鲁 詹姆斯·罗宾逊

Economics versus Politics: Pitfalls of Policy Advice

by Daron Acemoglu and James A. Robinson

24 宪政与经济政策

托尔斯滕·佩尔松 圭多·塔贝里尼

Constitutions and Economic Policy

by Torsten Persson and Guido Tabellini

前沿

Guide

50 经济学与移民：人行道上的万亿美元？

迈克尔·克莱门斯

Economics and Emigration: Trillion-Dollar Bills on the Sidewalk?

by Michael A. Clemens

比较之窗

Comparative Studies

72 城市的经济学分析

爱德华·格莱泽

The Economics Approach to Cities

by Edward L. Glaeser

视界

Horizons

100 美国经济增长的前景

布拉德福德·德龙

Is Growth Getting Harder? If so, Why, and What Can We Do about It?

by Bradford DeLong

120 曼德拉身后的南非：从自由路到致富路

张春霖

South Africa in the Post Mandela Era: From Freedom to Rich

by Chunlin Zhang

法和经济学

Law and Economics

128 竞争政策与自然垄断行业的价格管制：信息、激励与治理

德里克·莫里斯

Competition Policy and Regulation of Prices in Natural Monopolies:

Information, Incentives and Governance

by Derek Morris

特稿

Special Feature

144 全球经济中的格林斯潘—伯南克泡沫

罗纳德·麦金农

Greenspan-Bernanke Bubbles in the Global Economy

by Ronald McKinnon

160 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基本思路与政策建议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财税改革课题组

Basic Thoughts and Policy Recommendations for Deepening the Fiscal
and Taxation Reform

by Research Group of the Fiscal and Taxation System, CCIEE

经济学 VS 政治学

政策建议的误区

达龙·阿西莫格鲁 詹姆斯·罗宾逊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制定政策的基本方法来自对市场失灵的认识，诸如外部性、公共产品、垄断、不完全竞争等问题的存在，为旨在提高社会福利而精心设计的公共干预提供了可能。这个传统方法由庇古（1912）首先明确，之后萨缪尔森（1947）对此进行了详细的阐述，至今大多数经济学家在提出政策意见时仍然以此为理论依据。例如，在 20 世纪 50 年代，最早的发展经济学家们就以市场失灵论为理论基础，提出政府干预在推动落后国家发展中的重要性（Killick, 1978）。虽然人们对政府的能力或者扶持效果将信将疑，但是，当前解决发展问题的方法与传统方法仍有很多相似之处。尽管目前的方法越来越复杂，比如，在政策设计时会结合信息摩擦来识别次优问题（例如 Townsend, 2011）；主张根据实际情况因地制宜制定政策（例如 Rodrik, 2007）；强调严格运用经验研究方法来判断哪种干预方式会更有效（例如，

* Daron Acemoglu，麻省理工学院经济系教授，经济增长和新制度经济学领域的领军人物，曾获 2005 年克拉克奖。Acemoglu 教授的主要研究领域为政治经济学、经济增长与发展、人力资本理论、创新以及就业等。James A. Robinson，哈佛大学政府系教授。他们的合著 *Why Nations Fail: The Origins of Power, Prosperity and Poverty* 受到广泛赞誉，是近年来最有影响的经济学书籍之一。原文发表于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 Vol. 2 No. 2 (2013)，第 173—192 页。作者感谢 David Autor、谢长泰（Chang-Tai Hsieh）、Simon Johnson、John List、Suresh Naidu 和 Timothy Taylor 的有益评论。

Banerjee 和 Duflo, 2011)。但无论是上述何种方法, 都缺少对政治因素的考虑。

忽略政治因素往往被认为是不无道理的, 原因有三: 其一, 认为政治家们基本上或多或少地对提升社会福利感兴趣, 因为在社会中行之有效的政策能够帮助他们继续掌权或者获得连任, 正如惠特曼 (Whitman, 1989, 1995) 以及穆里根等人 (Mulligan 和 Tsui, 2006, 2008) 的模型所描述的。

其二, 视政治为随机因素, 它对经济政策制定的影响, 就如同车轮沾上了星星点点的砂砾, 可能会导致潜在的风险但无伤大碍 [例如, Sachs (2005) 或 Banerjee (2012) 指出, 利比里亚独裁者塞缪尔·多伊的经济政策是灾难性的, 因为他不知道当总统应当做些什么]。

其三, 虽然承认政治经济学很重要, 但同时也认为“好的经济学就是好的政治学”, 这意味着好的经济政策必然会放宽政治约束 (例如 Boyco、Shleifer 和 Vishny, 1995; Banerjee 和 Duflo, 2011, 尤其是第 261 页; Sachs 等人, 2004)。其含义与前两点是一致的: 政治家们能够坚定地支持那些既能解决市场失灵问题, 又能释放有益政治力量的经济政策。

本文不仅要讨论经济政策建议在忽视政治因素时存在的风险, 还会讨论由于一些系统性力量的存在, 当政治因素较经济因素占上风时, 好的经济学就会演变成坏的政治学。当然, 这并不是说让经济建议偏离发现市场失灵并提供创造性解决方案的轨道, 也不是说好的经济政策不掺杂偏见。相反, 我们的观点是, 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 经济分析都需要搞清楚政治因素和经济因素在什么情况下会陷入冲突, 在考虑这种冲突及其潜在后果的基础上, 再来评估政策建议。

我们的基本观点很简单: 当下的政治均衡可能难以避免市场失灵的影响, 甚至有赖于市场失灵。面对工会利用垄断来提高其成员工资的行为, 大多数经济学家都建议消除或者限制工会的垄断权力, 这在某些情况下无疑是正确的政策。但是, 工会不仅影响着劳动力市场运行的方式, 也同时影响着政治体系。纵观历史, 工会在全世界很多地方尤其是西欧地区的民主建设中扮演了关键角色, 它们曾经建立、资助和支持过政治党派, 比如英国的工党、斯堪的纳维亚的社会民主党等, 这些政党极大地影响了公共政策、课税范围和收入再分配政策, 还常常影响商界和政界之间的政治力量平衡。因为人们加入工会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工会能为其成员争取更高的工资, 削减工会的市场力量很可能导致去

工会化。然而，进一步强化那些已经在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团体及其利益，会导致更多的效率损失，从而改变政治均衡。这个例子揭示了一个更为普遍的结论，也是我们的核心观点：即使我们有可能通过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来消除市场失灵，然而一旦考虑到对政治均衡的可能影响，我们不一定会这么做。一项政策是否值得实施，我们必须考虑它可能导致的政治后果，而不仅仅是关注经济成本和收益。

为了进一步论证这个观点，我们构建了一个简单的理论框架，用于解释经济政策和政治均衡之间的关系。我们将重点说明，为什么在进行政治经济学分析时，仅仅分析经济成本和收益还不够，以及较之于标准的次优分析方法，我们的方法如何通过提供一些指标，以此判别何种类型的市场失灵一旦被消除，最可能对政治均衡产生不利影响。那些强化社会主导群体的势力却弱化其政治平衡力量的经济政策是我们关注的重点。我们需要结合政治因素和经济因素，更全面地对这类政策加以研究，以避免意料之外的政治影响。

随后，我们讨论三种宽泛的机制所导致的情形，在这些情形下好的经济政策有可能带来糟糕的政治后果。首先，当前的经济租金会影响政治均衡。在解决市场失灵的过程中，减少某些团体的经济租金的政策也许会产生意料之外的政治影响，尤其是这些被削减的经济租金原本属于那些势单力薄的团体时，就会进一步破坏社会力量的均衡。第二，即使不改变经济租金，收入分配也会影响政治均衡。这意味着对于那些提高经济效率的政策而言，其分配效应的政治后果是不可忽视的。那些进一步加剧不平等的政策最可能产生适得其反的政治影响。第三，政治激励相容约束决定了政治家应当得到满足的利益，但是消除市场失灵的政策有可能使某些团体的利益得不到满足，从而导致政治上的强烈抵制。每种情况我们都提供了几个例子来解释这些机制是如何运行的。

就此而言，我们的机制基本上是解释性的。我们试图说明，我们的研究框架想要重点讨论的一些问题存在于古往今来的许多重要事件当中，并且与基本的政治经济学方法之间有一些重要的共同点，将事与愿违的政治影响同既得利益群体巩固其地位的经济政策联系在一起时，尤其如此。一个对这些议题更为系统的经验和理论分析无疑是必要的，这将有利于发现重要的规律和经验，扩展我们对经济和政治如何相互影响的认识，并揭示经济学家可以从政治学中取其精髓。

一个简要的框架

为了便于说明以上观点,并在下一部分中对机制问题展开讨论,现引入一个两期模型。假设一项经济政策在两个没有任何经济联系的时期都必须被实施。另外,假设在第一个时期政治家在政策选择上有一定的自由。即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政策有选择的余地,所以并未完全被既得利益者或当权者所左右。政策选择或许还会受到经济学家所提意见的影响,比如,为了纠正市场失灵而提出的建议等。在第二个时期,政策将在政治均衡下被决定。

首先,我们关注一个与政治学无关的经济学世界,在这里,两个时期之间没有任何政治联系(在经济上也是如此)。在这个世界里,做出第一个时期的政策选择无需考虑第二个时期的政治均衡。^①然而,现实情况却是,第一个时期的政策选择常常会强化一些群体而弱化另一些群体,因此会影响第二个时期的政治均衡。政治均衡进而将决定第二个时期的政策选择。因此,无论是追求福利最大化的政策制定者的目标,还是经济学家提出的建议,都不应当仅仅致力于解决眼前的市场失灵,还应当考虑第一个时期做出的政策选择对未来的政治影响。^②

到目前为止,这个观点类似于经济政策分析中著名的次优理论的政治版本(Lancaster 和 Lipsey, 1956)。但是,可探讨的不仅如此。大量的政治经济学分

① 如果用数学来描述,在没有政治因素的经济学世界里,在两个时期里实现福利最大化的政策 x_1 和 x_2 可以被独立选择, $\sum_{t=1}^2 W_t(x_t)$ (贴现率被压低,以使整个社会没有损失)。在这里 W_t 指在 t 期实现的社会福利。在这里,第一期中使社会福利最大化的政策或建议应当为 x_1^{SW} , 从而使得 $W'_1(x_1^{SW}) = 0$ 。

② 如果用数学来描述,可以将第二期的政策决定用 $x_2 = \xi(p_2)$ 来表示, p_2 是第二期中政治力量分布的一个指标。这个政治力量的分布部分取决于当前的政策,它可以概括为函数 π , 因此 $p_2 = \pi(x_1)$ 。

与本页脚注①相比,在这个世界里,未来的经济政策和政治状况是内生的,因此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需要(假设可微):

$$W'_1(x_1) + W'_2(\xi(\pi(x_1))) \frac{d\xi(\pi(x_1))}{dp_2} \frac{d\pi(x_1)}{dx_1} = 1$$

因此,除非 $d\xi/dp_2 = 0$ (从而未来的经济政策不依赖于未来的政治情况) 或者 $d\pi/dx_1 = 0$ (从而未来的政治状况不依赖于当前的经济政策), 这个等式的第二项不为 0, 意味着无论是福利最大化的政策制定者的目标还是经济学家提供的建议, 不仅应当解决当前的市场失灵, 也应将政治因素考虑进来。

析着眼于社会中政治力量的作用，尤其强调（1）经济力量与政治力量是相关的；（2）政治被少数利益集团或社会族群所主导将产生有害的影响（Acemoglu 和 Robinson，2012）。就此而言，如果政策从经济上强化主导群体或者弱化与主导群体相对立的群体的政策，就可能进一步改变政治力量的平衡，进而产生意料之外的负面影响。^① 此外，如果经济改革只能解决一些肤浅的表面问题，而不能从根本上改变政治和制度无效性的基础，它就有可能因违反“政治激励相容约束”而招致政治抵制，从而严重破坏现有的政治均衡或者政治联盟。随后，我们将讨论非洲的政策改革为何会成为一种地方病。非洲改革的着眼点通常不是基本的政治经济问题，而是这些问题导致的结果，比如糟糕的货币和财政政策。

当然，魔鬼隐藏在细节里。当前的经济政策选择会如何影响未来的政治均衡？政治均衡会如何影响未来所能达到的福利水平？显然，这些影响会随着条件的变化而有所不同，比如民主和非民主的情况就不一样。但是，我们认为，在很多情况下，这些影响不仅存在而且非常重要。

经济租金对组织的重要性

经济租金促使人们组织起来，尤其是抽取和/或利用租金来保护自己。组织的存在会产生强大的潜在政治影响。因此，根除市场失灵及其产生的租金常常会改变特定个人和群体对组织的投资，进而影响政治均衡。因此，经济政策的决策应当考虑或至少应当研究政策给不同政治组织带来的影响。

租金、工会化和民主

在多数情况下，与没有参加工会组织的雇员相比，工会推高了其成员的工资水平，这无疑造成了经济扭曲。工会还有可能造成其他扭曲，比如阻碍雇主采用某些技术和提高效率的举措。因此，削弱工会推高工资的力量就成为主流

^① 紧接着上页脚注②，我们首先需要对政策排序，例如，数值较高的 x 表示政治强势群体。如果将政策现状按此排序，没有任何干预情况下的现行政策可用和 x_1^0 表 x_2^1 示。假设 $x_2^0 > x_2^{SW}$ ，此时未来的情况偏向有利于政治强势群体，当 x_1 上升时 p_2 也会上升（变得有利于强势群体）。只要包含 $x_1 > x_1^0$ 的任何政策改革（比当前状况更有利于政治强势群体）都导致 p_2 的增加，进一步改变第二期的政治均衡，使其有利于政治强势群体。这又导致更高的 x_2 值（扩大了第二期的实际政策和最优政策之间的差距）。我们的框架表明，应当仔细研究这几类政策的政治影响。

的经济政策建议。反对观点则主要基于以下的经济理论：工会在确保一个更为公正的收入分配体系方面发挥着作用，尤其是它有利于提升低收入工人的工资；另外，工会可以对抗企业在设定工资方面的垄断力量。

在我们的分析框架下，关键点在于，任何削弱工会提升工资能力的政策即使不会直接增加组织工会的难度，也会间接导致工会活动的减少。毕竟，当很多工人只能得到有限的好处时，他们不再认为加入工会是值得的。在我们的分析框架下，今天的政策将影响明天的组织投资，进而影响政治力量的分布（在本例中指工会的力量）。此外，在很多情形下，尽管当前工会力量强大，但力量的平衡已经向大雇主倾斜，削弱工会可能导致社会中的政治力量更不平衡，由此会产生潜在的动态成本。

正如我们已经提及的，工会不仅致力于争取更高的工资或试图影响企业的内部组织，它一直以来也通过采取一些可能影响政治均衡的方式而活跃于政治领域。工会政治力量最重大的影响之一是，它们在全世界创造和支持民主制度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当政治力量在非民主环境中分布非常不均衡的时候，这种作用尤其明显。最近有一篇文献分析民主制度形成的影响因素，它与早先的文献观点迥异 [早期文献如 Moore (1966) 强调中产阶级或资产阶级的角色]，也有别于通常的观点，即在民主的兴起和蓬勃发展过程中，工人阶级或社会的贫困群体常常起到决定性作用 (Rueschemeyer、Stephens 和 Stephens, 1992; Collier 和 Mahoney, 1997; Acemoglu 和 Robinson, 2000, 2006)。这篇新的文献认为，工人阶级组织或从事集体行动对其推动制度改革的能力很关键。由于工会的职责是组织工人，从这个意义上讲，工会的存在有助于促进推动制度变革的集体行动。大量的案例研究和计量经济研究也支持对社会冲突的这种关注 (例如, Adit 和 Jensen, 2012)。

从“一战”前欧洲的第一次民主化运动，到反对波兰政府的波兰团结工会再到南非总工会 (COSATU) 发起的反对种族隔离制度运动，工会都在民主化进程中扮演了关键作用。最近的典型案例之一是 1979 年巴西劳工党 (PT) 的成立。这个党派诞生于圣贝尔纳多的斯堪尼亚卡车工厂的罢工事件。圣贝尔纳多冶金工人的领袖是一个 33 岁的激进分子，名叫路易斯·伊纳西奥·卢拉·达席尔瓦，也被称为卢拉。他帮助组织了席卷巴西的一系列罢工运动中的首次罢工，并向军事独裁体制发起挑战。乍一看，那些罢工运动是针对工资和工作条件的，但是据卢拉后来的回忆：我认为我们不能将经济和政治因素区分开

来；这场……斗争是针对工资的，但是在为工资斗争的过程中，工人阶级赢得了政治上的胜利（引用自 Keck, 1992, 第 65 页）。罢工运动后成立的劳工党在巴西成功遏制军方力量的运动中成为先锋。

总体而言，那些削弱工会在为其成员协调工资和工作条件方面发挥作用的政策会减弱工会的政治权力。尽管卢拉和南非总工会在不利的政治环境中成功地组织了工会，但证据也表明，工会化率对助长垄断力量和租金的政府政策比较敏感（见 Rothstein, 1992；Western, 1999；Schmitt, 2012）。如果工会政治力量的存在对支持一系列其他经济和政治成果至关重要，那么对工会提高工资所带来的劳动力市场失灵进行干预，则会导致适得其反的效果。

这个观点还适用于美国的工会。美国工人加入工会组织的比例在 20 世纪 50 年代早期达到顶峰，此后出现回落。这与一些政策选择不无关系：1935 年通过的国家劳工关系法（《瓦格纳法》）及“二战”期间的各种举措鼓励了工会的成长，但在此之后，尤其是 1947 年劳资关系法（《塔夫脱—哈特莱法案》）通过以后，谈判环境变得不利于工会。此外，从 20 世纪 70 年代开始，鼓励自由贸易的政策增大了美国经济中的竞争程度，削弱了很多私人部门工会提升工资的能力。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里根政府的反工会立场（见 Farber 和 Western, 2002）。工会成员的减少或许会产生多方面的政治经济影响，例如，成为加剧收入不平等的重要因素（Western 和 Rosenfeld, 2011）。再深究下去，它或许还会导致 CEO 薪酬的激增（DiNardo、Hallock 和 Pischke, 1997, 2000）和金融部门的放松监管。

资源财富组织的影响

一种主流观点认为，一个国家自然资源的特定形式对经济和政治有着最为重要的影响。按照这个观点，博茨瓦纳的深开采钻石和塞拉利昂的冲积钻石对政治稳定会产生不同的影响（Ross, 2006）。然而，矿产品的重要性并不在于它们的固有特征，也不在于从经济学视角来看它们的开采是否得到了有效的组织，而是取决于它们的组织开采过程所产生的政治影响。我们通过比较澳大利亚砂金矿床和塞拉利昂金刚石矿床的开发来说明这一点。从基本的经济学视角来看，两个例子中矿产开采的自由进入都是无效率的。自然资源开采是“拥挤”的一个典型例子：大家开采的越多，给每个人剩下的就越少。解决这种市场失灵的一个办法是，将自然资源的排他性产权分配给一个大的开采商，这